黄宅镇志

第五卷

（人文古迹卷）

浦江县黄宅镇文化历史研究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黄宅镇志

第五卷

（人文古迹卷）

浦江县黄宅镇文化历史研究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前　言 …… 1
第一节　浦 阳 江 …… 1
第二节　诸暨与浦江 …… 3
第三节　考古工作概述 …… 7
第二章　蜜塘山背遗址 …… 16
第一节　遗址概述 …… 16
第二节　东区遗存 …… 21
第三节　西区遗存 …… 26
第四节　良渚文化墓地 …… 30
第三章　综　论 …… 115
第一节　浙江新石器时代考古中的“二元论”问题 …… 115
第二节　楼家桥文化类型 …… 119
第三节　良渚文化和“后”良渚文化问题 …… 126
第四节　遗址记录的几次洪水事件及其意义 …… 132
第五节　上山遗址第三期考古发掘情况汇报 …… 133
第六节　第四届环境考古学大会暨上山遗址学术研讨会上山遗址考古报告 …… 136
第七节　“上山文化”新闻发布稿 …… 145
附录：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上山遗址保护总体规划 …… 191
第四章　不可移动文物名录 …… 283

第一节　浦江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名录 … 284
第二节　浙江省浦江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重要不可移动文物一览表 …… 299
第五章　黄宅镇名胜古迹 …… 333
第一节　古城胜迹 …… 333
第二节　官岩山 …… 407
第三节　桐木殿胡公大帝 …… 418
第四节　上市关王殿、万年台 …… 421
第五节　上山文化历史遗存——太祖庙 …… 422
第六节　六社香火——华船殿 …… 423
第七节　鹤鸣九皋　声闻于天 …… 425
第八节　定光寺重修碑记 …… 426
第九节　普义庙的变迁 …… 427
第十节　浦阳江上竹筏行 …… 429
第六章　其他文物遗存与传说 …… 432
第一节　深溪义门王氏梅石坞村流源王氏家庙创始史 …… 432
第二节　群山环抱的万年古域浦江 …… 433
第三节　说古道（治平） …… 434
第四节　青龙头之说 …… 436
第五节　前陈村文物遗产 …… 438
第六节　合心村文化遗产 …… 442
第七节　杨林村花厅 …… 444
第八节　桐木殿朱宅“十八都朱宅”的历史发展 …… 446
第九节　中华名门望族——任姓 …… 449
第十节　黄 义 门 …… 452
第十一节　乡间文物遗产录 …… 454
第十二节　杭州府诸暨县至浦江官道 …… 455

第十三节　浦江门户普义桥 …… 456
第十四节　探访石塘头“四教堂” …… 459
第七章　黄姓的堂名解读 …… 462
第一节　堂的由来 …… 462
第二节　试析堂名的文化意义 …… 463
第三节　堂名存目 …… 466
第四节　理和堂，因沧桑而美丽 …… 468
第八章　人　物 …… 471
第一节　黄宅镇进士史 …… 471
第二节　黄氏人物篇 …… 472
第三节　戚继光祖籍戚家桥 …… 494
第四节　李孟宣其人 …… 497
第五节　黄宅籍近代人物 …… 502
第六节　模范人物名录 …… 576
第七节　黄宅镇革命烈士英名录 …… 581
第九章　民间传统文艺 …… 584
第一节　灯　彩 …… 584
第二节　灯　艺 …… 585
第三节　文　娱 …… 586
第四节　曲　艺 …… 586
第五节　戏　剧 …… 592
第十章　迎会艺术之说 …… 596
第一节　黄宅迎会前言 …… 596
第二节　九龙门第溯渊源 …… 597
第三节　纪念胡公会的发展 …… 601
第四节　巧会红江南 …… 603
第五节　改革开放重传扬 …… 605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六节　华夏一绝绝在险 …… 621
第七节　运用力学制作巧 …… 622
第八节　流动戏剧小演员 …… 622
第九节　会后锣鼓什锦班 …… 625
第十节　旗影高扬气势壮 …… 627
第十一节　书画节上迎会欢 …… 628
第十二节　浦江迎会震钱塘 …… 632
第十三节　江山美人影视传 …… 634
第十四节　浦江迎会对外交流一览 …… 637
第十五节　迎会参加影视片拍摄 …… 638
第十六节　迎会的相关器具及制品 …… 638
第十七节　浦江迎会(电视专题片) …… 639
第十八节　青山岩迎会赋 …… 643
第十九节　浦江迎会散记 …… 645
第十一章　山脉桥梁水系地名街道遗存 …… 657
第一节　黄宅镇山脉桥梁水系简述 …… 657
第二节　黄宅地区地名志 …… 662
第三节　黄宅镇街道命名由来 …… 663
鸣谢录 …… 665
后　记 …… 667
黄宅镇志编纂机构与编撰人员 …… 669

第一章

前言

第一节 浦阳江

浦阳江，钱塘江支流。发源于浙江省浦江县花桥乡天灵岩（海拔818米）南麓岭脚大园湾，自南（偏西）向北流经浦江县，诸暨市、萧山区，至萧山闻堰镇南侧小砾山注入钱塘江。干流长149.7公里，集水面积3451.5平方公里。多年平均年径流量24.6亿立方米。上游河宽22～75米，下游河宽80～120米。流域在会稽山脉与龙门山脉之间。从地形看，浙江山脉均呈西南——东北走向，北部由西向东分别为天目山脉，龙门山脉，会稽山脉，四明山脉等，这些山脉孕育了钱塘江、浦阳江、曹娥江等水系。

历史上浦阳江或曾独立入海（杭州湾），因列“吴越三江”之一。三江者，《吴越春秋》记为“浙江（钱塘江）、浦江（浦阳江）、剡江（曹娥江）”，《国语》韦昭注为“松江（沪淞江）、浙江、浦江”。明清以来，学者多沿旧说，认为浦阳江下游古道原从萧山临浦镇北走，再东折，经钱清镇而在绍兴注入杭州湾，至明代凿通碛堰山，始北出萧山。今人陈桥驿倾向于浦阳江从史前以来就走萧山，否认东折绍兴的说法。《汉书·地理志》：“余暨，萧山，潘水所出，东入海。”按潘水即浦水、浦阳江。陈桥驿进一步考证，从晋至南北朝，浦阳江下游的水文地势颇合“东南地卑，万流所凑，涛湖泛决，触地成川，枝津交渠”的描述，江水下游与临浦、渔浦等湖泊汇成一片，并通过临浦入钱塘江。北宋中期以后，临浦等湖泊湮废，河床抬高，

浦阳江几度借道钱清江从绍兴三江口入海。明成化年间会稽郡守戴琥兴修水利，浦阳江复归萧山旧道[①]。

考古发现并未完全支持陈桥驿的证述。从一些遗址、遗迹的位置看，浦阳江下游古道并未与现行河道相合则是肯定的。萧山欢潭乡（今进化镇泥桥头村）茅草山遗址（本报告附录），分布范围从东侧河滩一直延伸到河堤之外，从调查情况看，西侧堤坝外仍有良渚文化遗物发现。可以肯定两岸的遗址是延续一体的，后来被浦阳江一分为二。茅草山遗址年代从良渚晚期、春秋战国一直延续到六朝，说明浦阳江在这一时段并未通过这里。义桥新坝一带也有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在河道两侧及河床，判断原为一个遗址。该遗址的上部叠压有商周地层及六朝水井等遗迹，在河道底部被侵蚀、冲决，可见及至汉、六朝时期，这里尚不是浦阳江河道的准确位置[②]。新坝遗址近碛堰山，从某种意义上给陈氏结论提供了反面的证据。但河道的摇摆可能在一定范围之内，因此考古发现也并未直接支持浦阳江东出三江口的旧说。

浦阳江上游落差大，源短流急，河道陡峻，来水迅猛。中下游两岸地势低洼，河道弯曲，易受内涝；下游受钱塘江潮水顶托，水流宣泄不畅，一遇暴雨则决堤为患，历来为洪涝重灾地区。因堤坝屡决屡筑，河床抬升，下游渐成地上河。故有“小黄河”之称。这种特殊的水文环境一直可以追溯到7000年前。位于浦阳江下游跨湖桥遗址的湮废，全新世海平面的上涨仅仅是大背景，江口波涌潮托的小环境则是遗址之上厚达4米多海湾相沉积形成的根本原因。尔后的楼家桥遗址（本报告之一）、茅草山遗址、新坝遗址中，均在不同阶段的地层中发现具有共同成因的淤泥厚积层。可以认为，历史上该地区人类生产、生活内容所构筑的文化传统必然地打上了浦阳江的烙印。

浦阳江流域宽阔，其上游谷地与仙霞岭、千里岗山之间的衢江河谷通连，成为浙东、浙北平原通向华南腹地的交通要道，浙赣铁

① 陈桥驿《论历史时期浦阳江下游的河道变迁》，《吴越文化论丛》，中华书局，1999年。

②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资料。

路及从沪、杭直通西南的高速公路均铺设在这一线。这一交通优势可能在史前时代就开始发生作用。如良渚文化的大本营在太湖南域，作为具有强大辐射能力的史前文明中心，向南转播的渠道在哪呢？从目前的发现看，钱塘江以南规模最大的良渚文化墓地——浦江雀塘山背遗址（本报告之一）、龙游寺邸园良渚文化墓葬[①]和具有明显良渚文化因素的江西修水山背遗址[②]、被公认为良渚文化因素最南分布的广东曲江石峡遗址[③]均可排列在这条通道及其延伸线上。学术界认为，跨湖桥文化与洞庭湖皂市下层文化有诸多相似性，可以从文化传播上寻找联系。如果得到证实，跨湖桥遗址正处在通道的海口远端，亦并非巧合。不唯如此，万年前上山文化[④]在这一带的孕育，又何尝不能看作是原始的狩猎采集者在这一通达之所的自然聚集呢？往近处看，号称春秋五霸之一的越国亦立国于浦阳江中下游的诸暨一带。

浦阳江流域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史前文明与历史时期文明重要的孕育与发展之地。

第二节　诸暨与浦江

一、诸暨的自然地理与历史沿革

诸暨是本报告楼家桥遗址、尖山湾遗址所在地。

诸暨位于浙江省中部偏北，地理坐标为东经119° 53’～120° 32’，北纬29° 21’～29° 59’，境域面积2318平方公里，其东边与绍兴市、嵊州市接邻；南面与东阳市、义乌市交界；西毗浦江县、桐庐县、富阳市；北邻杭州萧山区，人口106万。地处浙东平原和浙西北丘

①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资料。

② 彭适凡：《试论山背文化》，《考古》1982年第1期。

③ 苏秉琦：《石峡文化初论》，《文物》1978年第7期。

④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浦江县博物馆：《浙江浦江县上山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7年第9期。

陵山区两大地貌的交接地带，由东部会稽山低山丘陵、西部龙门山低山丘陵、中部浦阳江河谷盆地和北部河网平原组成。四周群山环抱，地势由南向北渐次倾斜，形成北向开口的通道式断陷盆地。东部会稽山脉，主峰东白山太白尖海拔1194.6米，为境内最高峰；西部龙门山脉，主峰三界尖海拔1015.2米，为境西部最高峰。中部为河谷盆地，多沃土良田：北部为为河网平原，水资源充沛。浦阳江纵贯南北，境内主或干流长67.6公里，东西8条支流呈叶脉形展开。

诸暨地属中北亚热带季风区，年平均气温16.2℃，平均降水量1346.7毫米，平均雨日158.7天，无霜期236天。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雨水较多，光照充足，小气候差距显著，具有典型的丘陵山地气候特征。

境内土壤有红壤（丘陵山地的主要土壤类型）、黄壤（海拔500米以上丘陵山地主要土壤类型）、岩性上（浦阳江河谷两侧低丘）、潮土（浦阳江干、支流沿江两侧，沟谷溪边和山口洪积扇）和水稻土。植被类型为东亚植物区系华东地区成分，以针叶林和常绿阔叶混交林为主，种类主要有松科、杉科、壳斗科、樟科、山茶科、蔷薇科、豆科等。

诸暨历史悠久，然上古传说与史实并杂，难以尽释。夏少康封庶子无余于越，封地即在县城北面“埤中”，及至允常，埤中长期作为越国早期都城。史载允常时越国疆土南至勾无、北至御儿、东至鄞、西至姑蔑，勾无即诸暨南部的勾乘山。诸暨为越国古地，庶几无误。苎萝美女西施，亦诸暨人也。

“诸暨”名词由来，更可“远溯诸夏商周而上”（《光绪诸暨县志》）。明（《隆庆诸暨县志》认为，“诸暨之得名……或曰禹会计而诸侯毕及也”，“诸者，众也；暨者，及也。”另说诸暨源自祝融八姓之诸稽氏，诸稽受封于浙，始有诸暨（稽）国。清《乾隆诸暨县志》：“诸暨者，诸暨国之地也”；宋《路史》亦将诸暨作为一个方国载入《国名记》。《国语·吴语·疏》：“诸稽之裔，以国为氏。”直至商代，诸稽国才灭亡。韦昭云：“彭姓诸稽，则商灭之”《国语·郑语》）。清人郭凤沼认为：“诸暨即诸稽”，“夫古赐土姓，胙之土，而命之氏。

稽暨声近，同音假借”。故而诸暨国早于越国，至商灭诸暨后，地遂属越。“按少康庶子所封，初在县北一隅，与今山阴、会稽两县连界，自外皆诸暨地也，及商灭诸稽，而夏后氏并有其地，以至于允常，此实录也。”[①]以此诸暨的上古史似可颇合逻辑地宣告成立。然时间远去，史迹漫漶，后人渐无确信过往的足履，追而溯之，妄猜附议者多，以至歧义纷出，真假莫辨。据邑人杨士安考证，诸暨之义除上述两种，尚有“诸山、暨浦”地名说、越王无诸教化所及（暨）说、古越语说等六种解释[②]。

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始设诸暨县，属会稽郡（全国三十六郡之一）。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属杨州刺史部会稽郡。新莽时改称疏虏（卤），建武初复旧。汉至唐，所属之会稽、杨州区划建置或有所动，但诸暨县建置一直未变。汉末，县西南一部曾分析置入汉宁县（三国改吴宁）丰安县（即后浦江县）。隋废吴宁县，旧地复归。唐属越州，唐末改称暨阳县，吴越国天宝元年复称诸暨县。宋属两浙东路，乾道八年（1172年）析置义安县，三年即废。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升诸暨县为诸暨州，属江浙等处中书省绍兴路。至正十九年（1395年），胡大海克诸暨，改诸暨州为诸全州。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降州为县，仍复旧名。属浙江等处承宣布政司绍兴府。清袭明制，诸暨县属浙江省（布政司和按察司）绍兴府。民国初年属浙江省会稽道，1927年道制废，直属浙江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诸暨县先后归属绍兴、金华、宁波专区。1964年一直属绍兴专区（市）管辖。1989年，经国务院批准，撤诸暨县，设诸暨市（县级）[③]。

二、浦江的自然地理与历史沿革

浦江县为本报告蜚塘山背遗址所在地。

浦江位于浦阳江上游。境域面积899.57平方公里，人口约38

① [清] 郭凤沼：《诸暨青梅词注》，1850年。

② 杨士安：《也谈“诸暨”的由来》，《诸暨史志》1986年5期。

③ 诸暨县志编撰委员会办公室：《诸暨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万。东南界义乌。东北连诸暨，西南与兰溪毗邻，西北和建德、桐庐接壤。浦江县在大地构造上属于钱塘江凹陷的中东部，为丘陵地区。地形以低山丘陵为主，约占全县总面积的81%。县内主要山脉为北、中、南三支。北支为龙门山脉，其中朝天门海拔1050米为县域最高峰。中支山脉属龙门山系，俗名北山，由东向西横亘浦江中部，南支山脉属会稽山系，婉蜒于与义乌、兰溪交界。南支山脉与中支山脉对峙，中间为浦阳江河谷盆地。

浦江气候属中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区，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16.4摄氏度，年平均降水量为1412.2毫米。主要气象灾害有大风、冰雹、洪涝和干旱。洪涝多在梅雨汛期的5、6月和台风影响季节的8、9月。干旱主要在盛夏的7、8月。

浦江地质构造属浙西构造单元，几经沧海桑田，历中生代燕山地壳运动褶皱成山，断陷成盆地。地层较为齐全，元古代至新生代地层均有暴露。岩石以火山凝灰岩分布最广，还有沉积砂岩、页岩、红色黏土以及变质枚岩、板岩等。土壤有红壤、黄壤、岩性土、潮土、水稻土五大类。

浦江县历史悠久，春秋战国时期，初为姑蔑之地，后姑蔑为越所灭，归属越地。战国越为楚所败，又属楚。秦王政二十五年，浦江属乌伤、太末两县地。属会稽郡。东汉献帝兴平二年(195年)，分太末、诸暨立丰安县，为浦江建县之始。三国时，丰安县属扬州之东阳郡(会稽郡析置)。南朝陈天嘉三年(562年)东阳郡改金华郡，浦江县属金华郡。隋开皇九年(589年)，废丰安以其地入吴宁(金华)，立为婺州婺镇。唐天宝十三年(754年)，又析义乌、兰溪及富阳置浦阳县，以境内浦阳江得名。吴越天宝三年(910年)，改名浦江县。县名一直沿用至今。宋元时属婺州，明清时属金华府，民国时属金华道，后直属浙江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浦江县属金华专区(市)。1960年撤销浦江县建置，大部并入义乌县，1967年恢复浦江县[①]。

① 浦江县县志编撰委员会办公室、浦江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浦江县地名志》，1986年。

第三节　考古工作概述

一、楼家桥遗址的发现与发掘

1996年4月～7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杭金衢高速公路建设，委派蒋乐平、黎毓馨等对拟建中高速公路沿线进行考古调查。6月，在进行萧山段调查时，由萧山博物馆倪秉章提供线索，在萧山、诸暨交界位置发现遗址。旋即确认所在位置属于诸暨市次坞镇楼家桥村，因名楼家桥遗址。遗址因村民掘土暴露数块泥质红陶、夹砂褐陶片和半截鼎足，初步定为河姆渡、马家浜文化时期遗址。楼家桥遗址的发现点在高速公路东面150多米处的庙后山东侧，预计遗址范围向高速公路延伸，濒临建设性破坏，因列为抢救性考古发掘点。1998年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包括楼家桥遗址在内的高速公路沿线文物点进行复查，确认楼家桥遗址为重点发掘项目。

1999年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考古队，对楼家桥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考古队成员为蒋乐平、郑建明、张海真、夏朝日，蒋乐平任领队。诸暨市文化局方志良、次坞镇文化站吕关海参与了发掘工作的组织协调。

4月19日，考古队正式进点发掘，但一个意外的情况差点使发掘工作半途而废。当考古队员来到楼家桥村东北部的遗址点时，发现这里竟然是“汪洋一片”，预想中的发掘区成为了“泡影”。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遗址东南侧有一条小河（俗称诸萧河）通过，这条小河流向浦阳江下游的一条支流——凰桐江，受钱塘江潮水顶托，江水回潮一直可以抵达这里，特别是春夏季节。据村民介绍，遗址位置总会出现每月二大潮（阴历月初初一至初八与月中十四至二十）、每天又有小潮的自然现象，遗址将有一半时间处于淹没状态。蒋乐平此前两次到达遗址现场，恰逢潮落期，因此对此毫无准备。这也解释了他心头的一个疑问：遗址发现位置俗名叫“十八亩头”，为一片低平之地，当地农民却没有开辟为耕地。

怎么办？这次考古发掘除了配合高速公路建设，还有一个明确的学术目标，就是想探索浦阳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演变问题，特别想弄清河姆渡文化阶段这一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特征。1990年萧山跨湖桥遗址发现[①]，经碳十四测定其年代为距今8000年，超过河姆渡遗址，但学术界一直对此抱有怀疑态度。楼家桥遗址与跨湖桥遗址同处浦阳江下游地区，它们将会是怎样的关系？过去习惯将浙江新石器时代文化划分为钱塘江以北的马家浜——良渚文化与钱塘江以南的河姆渡文化，位于钱塘江以南的楼家桥遗址能够简单地归划到河姆渡文化吗？实际上，钱塘江北、南的史前文化概念不过是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的泛化，因为过去的考古工作大多集中在这两个地区，整个浙西南乃至浙中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基本没有开展。楼家桥遗址的位置恰好处在浙东平原与浙中山地的过渡地带，通过该遗址，是否能够揭开浙中、浙西南原始文化真实面纱之一角呢？考古队希望通过发掘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并不想轻言放弃。

在诸暨市文化局、次坞镇文化站的协调和村委会的大力支持下，考古队决定在庙后山西侧水稻田进行探掘，结果发现这一带也有遗存分布。其时正是蓄水插秧季节，通过对村民的说服、引导和适当的经济赔偿，并经过艰难的排水沥田，考古发掘终得以在这里开辟新的发掘区。新开辟的发掘区定为遗址西区，庙后山东面(遗址最初发现位置)定为遗址东区。

遗址西区共布5×10米探方4个，编号为T1、T2、T3、T4。发掘时间从4月下旬延续到6月下旬，但该区域遗迹现象稀少，遗物也不甚丰富，并非遗址中心区域。与此同时，考古队对遗址东区环境进行了更深入的考察，发现在一般情况下，潮水并不能淹没庙后山东坡的一片桑园地。为了解东区遗存的堆积情况，决定在这片桑园地进行探掘。给村民适当赔偿后，考古队在桑园地布下东西向2×9米探沟一条，编号TSI，由郑建明负责发掘。东区地层堆积远比西区深厚，约在深4米处，出现一层淤泥层。由于发掘空间已十分狭窄，考古队

①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跨湖桥遗址发掘简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长征出版社，1997年。

员冒着塌方的危险在淤泥层下探得夹炭黑陶片若干，确认有更早的文化层存在，这使考古队深受鼓舞。2米宽、4米深的探沟还是在一场雨水过后坍塌了，由干早有所警觉，除了一柄锄头被埋，没有人员受伤，可谓有惊无险。抱着更大的希望，考古队不但决定全部清理出坍塌物，而且决定将探沟进一步向东延伸。这样，探沟的东端已经超出了桑园地、到了潮水可以抵达的下级台地。为抵挡潮水，又采取围土筑堤的措施，利用发掘土将探沟围堵起来(这一方法，后来又应用到正式发掘中)。通过这样的办法，考古队克服潮水带来的困难，坚持完成了发掘。发掘的重要成果是在淤泥层下发现了河姆渡文化的典型器——夹炭绳纹带脊釜，说明遗址早期可以早到河姆渡文化早期。令人惊奇的是，楼家桥遗址特有的一种带脊棱的柱状足鼎在遗址早期居然已经出现，在过去发现的河姆渡早期阶段的遗址中，绝不见鼎。另外，淤泥层下还发现了动物骨头和木质遗物。

发掘期间，房东柴国兴家后院打井，在深2米多处发现有楼家桥遗址同类型陶片出土，该位置在庙后山西约500米。发掘临近结束时，蒋乐平、郑建明在遗址北边的江堤上，发现散落的黑泥以及与楼家桥TS1底层出土的特征一致的陶片。通过跟踪访问，探知楼家桥遗址东北向约1公里的萧山浦阳镇舜湖里村有村民掘井，前去调查，井已掘好，泥土中发现与楼家桥遗址共同特征的陶片和动物骨头。这两处遗址点说明一个聚落群的分布范围。

1999年上半年楼家桥发掘的实际面积为200平方米。7月14日，发掘结束。

东区的探掘成果坚定了考古队继续将遗址发掘下去的决心。蒋乐平利用盛夏休整的时间，将楼家桥遗址的发掘成果整理成书面材料，向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军所长汇报并陈述了遗址发现的意义及进一步发掘的必要性，得NT领导的认可与支持，计划下半年继续进行遗址发掘。

1999年10月8日～2000年1月9日，楼家桥遗址进行第二期发掘。参加发掘的除蒋乐平、郑建明、夏朝日、张海真外，还有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技工杨科民、刘天运、邓来善，蒋乐平继续担任领

队。发掘共布10×10米探方6个，以象限法编号，分别为T0707、T0708、T0807、T0808、T0809、T8010。这期发掘，考虑到遗址出上陶片碎散严重，陶器修复比较困难，因而安排张海真、邓来善边采集、边修复，力图提高修复效率。该期发掘的核心收获，是认定楼家桥遗址早期文化层中出土的以柱状(或带扉棱)足鼎、隔沿深腹缸和夹砂陶器上流行的以猴头为主的动物堆塑，与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的典型陶器绳纹有脊釜、泥质红陶豆、单耳罐共存，反映了在距今6000多年前，浦阳江下游地区存在一种与浙东北平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密切联系，但又具有鲜明自身特色的地域文化类型。

2000年3月22日～6月20日，对楼家桥遗址进行第三期发掘。参加发掘的有蒋乐平、郑建明、夏朝日、张海真、胡少波。蒋乐平为领队。这次发掘共布10×10米探方4个，编号为T0607、T0709、T0710、T0811，与第二期发掘区相连。发掘期间，又对遗址南面约1公里的猪山北侧耕地进行探掘，出土鸡冠板、扉棱足、石镞等遗物。

至此，楼家桥遗址三期发掘工作结束。

楼家桥遗址的发掘工作得到了诸暨市政府、次坞镇政府和楼家桥村的大力支持，也得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领导、同事的密切关注。诸暨市文化局领导张尧国、葛波儿等多次到遗址现场协调工作。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所长刘军、考古室主任陈元甫、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王明达和王海明、芮国耀、赵晔、孙国平、方向明等领导、同事也多次到现场考察发掘工作。同时，多学科的研究工作也初步开展起来。第一、第二期间，浙江农业大学郑云飞博士两次来到遗址现场，就遗址的水稻遗存进行考察并做了标本的浮选、采集。第三次发掘期间，浙江自然博物馆金幸生来现场对遗址出土的动物标本进行了考察，并选走部分标本进行研究。考古队还委托金幸生采集地层土样到南京大学进行孢粉分析，以便取得环境研究的资料。

二、浦阳江流域考古调查与蜜塘山背、尖山湾遗址的发掘

楼家桥遗址的发掘成果表明，浦阳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文化面貌具有地域特色。为进一步扩大考古成果，以期对这一地

区的原始文化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同意楼家桥遗址考古队的要求，决定以“浦阳江流域”作为一个拟想中的地理文化单元，进行比较系统的针对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调查工作。

2000年9月，由蒋乐平(领队)、郑建明、张海真、夏朝日、胡少波组成的考古队，一边进行楼家桥遗址发掘资料的整理工作，一边对浦阳江流域进行考古调查，至2001年1月上旬结束。调查工作得到浦江县、诸暨市、萧山区三地文物部门的大力支持。事实证明，这次调查收获巨大，浦江上山遗址的发现与发掘、萧山跨湖桥遗址的再发掘都是这次调查带来的机会，蜜塘山背、尖山湾遗址的发掘也是这次调查工作的延伸。

蜜塘山背、尖山湾遗址均为浦江、诸暨两地文物部门早已确定的遗址点。蜜塘山背遗址为20世纪80年代初发现，定为新石器时代遗址，并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尖山湾遗址于1981年发现，判定为新百器时代晚期遗址。以原有的遗址线索展开进一步的调查、探掘，是这次调查的一个基本方法。调查一开始，调查队就到两遗址的现场进行实地考察。现就工作的先后分别介绍蜜塘山背遗址和尖山湾遗址的考古工作情况。

(一)蜜塘山背的调查与发掘

2000年9月21日，蒋乐平在浦江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芮顺淦的引领下来到黄宅镇渠南村蜜塘山背遗址现场，与村支部书记周来水接洽后，决定立即进行试掘。第二天，调查队正式安排张海真和胡少波进点试掘。陆续开布3个试掘坑，编号为TS1、TS2、TS3。由于遗址点在村舍中间，TS1、TS2的位置局促在村庄道路与屋舍的狭窄处，TS3在一片葡萄园里。不同位置的探掘目的是了解遗址的分布及保存情况。结果除地势稍高的TS3没发现文化层，TS1和TS2均发现商周及良渚文化阶段地层。调查工作继续向周围延伸。首先尝试的是村庄西面的一片高地，高地上种满庄稼，给农户赔偿适当青苗费后，布下1×2米探坑1个，编号TS4，由张海真负责试掘。后来又安排郑建明到西面、北面的两个高地探掘，并发现长地和上山两个遗址。9月28日，TS4②层下发现墓葬M1，随葬品具有良渚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